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际关系学

□ 石 训

人类在 20 世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许多神话似乎正在逐步变为现实，衣食住行的状况，想也没想到变化得这么快，不少人似乎越来越感到地球变小了，自然资源并不是预想的那样取之不竭，现代科技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洪水的泛滥，沙尘暴的袭击，却向人们敲起了警钟，生长在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对待自然环境肆无忌惮，是要受惩罚的。回顾 20 世纪，人类显得很聪明，也很愚蠢。扩展聪明，减少愚蠢，未来的新世纪，才能更辉煌。

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是 20 世纪洒向人间的真挚的爱。挣脱了锁链的人们也摆脱了饥饿，被贫穷困扰的人们也达到了温饱。雍容华贵再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利；珠光玉影再也不是贵夫人的象征。通讯、交通等都把古老的神话变为现实，居住条件的改善之快也能够让人感到似梦幻般。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这一切变化如此之大，竟然使人感受到其没有发展过程，使他们陶醉于怡然自得之中，似乎感到世界本来如此吗。

在人们的生活道路上，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也有各种不同的阶段，而且其中充满着发展和变化。在温饱到丰盛的过程中，人们当然选择丰盛。而一旦丰盛得到以后，人们会有新的追求。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总有诱人的东西在前边闪烁。人类的物质生活，有史以来也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这样丰盛。在这种时候，一种错觉很容易产生，那就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来源于货币。只要货币多，一切都会有。换句话说，那就是“金钱万能”。这个古人早已发现的“诀窍”，今人好像又拾了起来。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没有它货物流通无法大规模地有序进行，社会不能很快地发展。正是因

为社会实际需要，人们才发现了它，培养了它，使它由无到有，由简到繁，这就是今天的货币模样。但是，人类如果地无分东西，人无分男女，都把追求金钱、货币当成人生目标，当成第一追求，那必然是一场大悲剧，人类的智德体的全面发展，必然受到极大的扭曲。这是当年那些发明货币的人和历代使货币制度日臻完善的人们所无法预料的，我甚至认为后来的现象，可能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一味追求金钱，会使人贪得无厌，甚至坑蒙拐骗，不择手段。

在货物流通领域，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以旧顶新，以次充好，用户叫苦不迭；如果是食物、药品弄虚作假，则是人命关天，罪大恶极。

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一味追求金钱的价值观，像刮起了一阵十二级台风，把正直、友谊、亲情，都吹得像秋风中的树叶，随风飘零，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人们的心灵深处，像纯净的溪流，遭受了巨大的污染。

上述种种，无疑说明在人类发展史上，自从货币制度诞生和发展以来，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千年以前，中国宋代哲学家倡导实学，就是着重研究“实事”，研究“实效”，而“实事”和“实效”都是极其复杂的，往往是对立的统一体，我们应该全面地了解它们、分析它们，驾驭全局，才能趋利避害。对社会之“实”，如果蒙上一只眼睛，就看不清，就会陷入片面性的泥潭。中国古老的故事，一个叫“瞎子摸象”，一个叫“坐井观天”，都是嘲讽片面性的。从古至今，都在分析片面之危害，可见其植根之深。

人的道德面貌纯净如水，它必然通过待人接物

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透明体，伴随着每个人走过一生的路。一味追求金钱的恶习，对这个透明体，确实是一场巨大的污染。本来是纯净的不纯净了，掺进了损人利己的杂物；本来是透明的不透明了，涂上了虚伪、欺骗的色泽。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在沟沟坎坎的道路上行走。只要心明眼亮，就能够踏踏实实地前进。

人类生活是群体的，若干年来自然地形成了互相信赖、互相帮助、和谐相处的社会人际关系。由于少数人贪得无厌，出现过无数次的对和谐环境的破坏，然后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再形成新的和谐相处的关系。尽管所费损耗很多，消耗过多，但总是可以调整的。近代以来，有人一味追求金钱，也有人迷惘无所适从，使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中，不和谐的成分涌动力量很大，不和谐的气氛，正在威胁着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世界现实，这是“实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人们无一例外地将以自己的明确行动，自觉也罢，不自觉也罢，都必然做出回答。在这种条件下，研究一下人际关系学实属必要。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人际关系学回答的问题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怎样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都会有不同的认识、习惯和规矩。因而，人际关系学必然是个复杂的、难以回答的题目。但是，从哲学角度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人际关系这门学问，从共性来说有些什么规律性的东西，从个性来说有些什么特殊之点，回答这些问题，是中西贯通的学问。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块构成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交往，其实质就是三个方面的交往。有时候是三者俱备，有时候是一方面为主，折射其他方面。不同国籍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不同国籍同民族、不同民族同国籍，或既同民族又同国籍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少不了上述三项内容。这是从总体说的。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思想深处，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但都少不了上述三项内容。是单一的，还是综合的，情况各不相同。只有这样考虑问题，才能够抓住人际

关系的共性，才能够对构建新型的人际关系学提纲挈领。

为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学，提出几点看法供讨论。

一、经济关系是人际关系的基础。经济利益互利互惠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人类自诞生以来，首要的问题是衣食住行的改善和提高。从渔猎、游牧到农业，直到后来的蒸汽机、电气机、自动化以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无不是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孜孜以求。中间夹杂着屠戮、奴役、战争等也是因为少数人只图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压迫多数人，同时受到反抗的缘故。因而，经济利益、经济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宋儒中的实学派李觏、陈亮等提出的治国之策“本于财用”、“务建实绩”等观点，都是可以借鉴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经济利益上的互利互惠，生活手段互补，生活条件互助，达到双方的心理平衡，平等相处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际关系保持和睦相处的基础。如果不是互惠互利，而是损人利己，甚至于残酷、凶恶地损人，贪吝无厌的利己，不仅不可能和睦相处，反而必然引起对抗、纷争、殴斗、厮杀等等。因而，回顾历史经验，面向未来的环境，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不能不把经济利益互利互惠原则放到重要地位来研究。

当然，互利互惠原则也不能完全理解为一方半斤、一方八两的关系。能够做到“半斤对八两”当然好，然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做到那些是不容易的。互利互惠是原则，而原则性和灵活性是不可分离的。原则性制约着灵活性，这是一层意思；原则性必须通过灵活性才能实现，这是另一层意思。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哲理，在研究互利互惠原则时也离不开它。这就是说，所谓互利互惠，“半斤对八两”是理想的，有轻有重也是允许的。此重彼轻，彼重此轻，都是正常的，时而彼重，时而此重，也是正常的。这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彼此双方的具体条件。这是个动态发展过程，其间充满着变化。这个变化有个界限是不得超越的：那就是双方的轻重变化不能达到畸轻畸重的程度。如果是达到了畸轻畸重，那就破坏了互利互惠原则的质的规定性，动摇了人际关系的基础，前景将是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的破裂。

由上述可见，维护互利互惠原则，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调整二字十分必要。可以这么说，不善于在互利互惠动态发展过程中做好调整工作，就不可能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条件。只有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随时调整利弊得失，避开畸轻畸重，让互利互惠原则在适当的幅度内发展，这就给良好的人际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处理好这个问题，既要有坚强的原则性，又要有高度的灵活性，要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既要有清晰的思路和方法，又要有细腻的艺术和手段，要求方法和艺术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处理问题，互利互惠原则就会在人际关系的动态发展中得到体现，人们之间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舍此，就是逐本求末。

二、平等协商，求同存异，是人们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社会形成之后，经过缓慢的发展，生产发达地区，先后出现了国家。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治，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政治因素，也可以说是政治关系。所以，不管是人们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都得在一定的国家政治环境中生活，人与人之间毫无例外地发生一定的政治关系。这就是人际关系中的政治因素。

政治关系表现为不同的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发生的不同作用，相互间形成的一定关系。政治关系也有种种不同的表现，诸如政治利益的基本一致，甚至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被指挥，管辖与被管辖等等。处理这些种种不同的关系，基本的原则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首先是平等，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儒家的传统观点“仁者爱人”是可以借鉴的。强者不能自以为强而不让别人讲话；弱者也不必自以为弱而不敢讲话。如果形成大欺小、强凌弱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终久要爆发，必然引发冲突和对抗。在这个问题上，各种类型的人际政治关系都是一样的。其中，作为领导者、指挥者、管辖者尤其要自觉，只要平等待人，就会让部属、下级感到亲切，愿意说出心里话，愿意任劳任怨，努力工作。如果不是这样，整天居高临下，动辄训人，绝对搞不好人际关系。

其次是协商。处理人们的政治关系协商原则十分重要。调整经济关系，这个方法也是适用的。由于人们的视角起点不同，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碰到这种现象，协商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各方面都满意的方案，往往一时拿不出来，必须反复协商，才会找到出路。特别是当利益冲突的时候，几种关系互相交错起作用，显得情况异常复杂多变，遇到这种情况，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急躁情绪毫无用处，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只有耐心协商才有希望。协商的方式方法应该多种多样，可以对坐交谈或者促膝谈心；也可以多边会谈共谋对策。可以直来直去，相互交锋；也可以先虚后实，虚实并举。如果这些“面对面”的方案均不适宜或者均不奏效，也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如聘请某种中介人从中斡旋，所谓“一手托两家”，也能起到某种特殊作用。这种交往方式是我国历史上政界和商界人士以及寻常百姓经常采用的协商方式，解决某种复杂的问题，往往能够得到好的效果。这也可以说是处理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东方文明特色的方式。协商的时间和地点，也不能草率从事，也必须有关方面协商而定。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登门拜访”表示谦恭之意；“略备小酌，光临寒舍”也不失为礼义之交；电话相邀到餐厅、舞厅边吃边玩边谈，多是当代人们喜欢采取的方式。不论哪种方式都是因人而异，以解决疑难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目的。关于协商时间与地点的约定，往往预示着实质性问题的解决程度和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因而，必须重视。思想重视了，方法也就适当了，效果也会好了。

最后是求同存异。在人际交往中掌握求同存异非常重要，在人们的政见交往中尤其重要。每个人都有的政见，只是自觉程度不同。政见相同者，交往容易，共同语言多，如“酒逢知己千杯少”之类；政见不同的交往有障碍，共同语言少，由于某种社会原因又不能不交往，如“话不投机半句多”之类。政见相同的交往也不见得一切顺利，其中有“诤友”，也有“马屁精”。诤友经常让人感到良药苦口，这个“苦”字有人耐得住，有人耐不住。耐得住者，倍尝先苦后甜之乐；耐不住者往往拍案斥责，致使关系疏离。“马屁精”与诤友相反，往往让人感

到先甜后苦。甜的时候倍感亲密，苦的时候后悔莫及。因为“马屁精”者，口蜜腹剑者也。他们只图与人同富贵，绝不与人共患难。私利是这种人的轴心，有时候甜言蜜语，有时候峥嵘毕露。善良的人如果只看同而不存异，自然会上当受骗。政见不同的相互交往也不可能自幼到老死，“反贴门神不对脸”，贯彻生命的全过程。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青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战场上兵戎相见，战争过后幸存下来还有重叙友情的，甚至于解囊相助的。这是最鲜明的例子。更多是所谓“不打不成交”，争吵过后，交往如常等等。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互相对人品、人格的深刻了解和尊重。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形成上述结果的。在社会不断前进，生产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人际关系中的同和异相比，同的方面越来越大，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如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人们需要协力抗争；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面前，人们需要协力治理；对国家对民族的基本责任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上述诸例只是举一反三，说明研究现代人们的政治理关系需要着眼于大同。眼界宽了，自觉程度也就高了，朋友也就多了。

当然，历史经验不断地向人们展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常常不按照人们的希望向前走，有时候和人们希望相反，出现些蛮不讲理的人和事，甚至于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这时候“同”和“异”相比，“异”大大膨胀起来，人际关系也必然随之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如能“防患于未然”，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多途径、多方式的协商。这是惟一的值得提倡的方式，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彼此尊重文化教养是处理人们之间的文化关系的重要前提。社会文化交往是非常广泛的，它比经济往来和政治往来更多。因为经济往来和政治往来都有文化往来结伴而行，或者是文化领头，或者夹杂其间，或者文化结尾。现行的流行语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由此可见，没有文化内容的交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一些交往活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文化，而不直接涉及经济和政治。所以，文化关系在人际关系中是更为广泛的关系。由于文化表明的是人类智

慧的积累，故而人际交往少不了智慧，也就是少不了文化。

为什么在文化关系中要强调尊重别人的文化教养呢？因为共同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教养是紧密相连的。俗语说：“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就是强调交往的共性。如果对原子物理专家谈论玉米怎样丰收，向艺术家请教导弹的射程为什么那么远等，是不会交谈得很愉快的。这叫“隔行如隔山”。比如，向一个文盲谈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多么优美，和一些十几岁的孩子谈《反杜林论》多么深刻等也不会获得满意的思想交流结果，这叫阅历不同，话题无法相同。再比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在文化交往中必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绝不能互相嘲笑，互相捉弄。否则，就会伤害民族感情，使良好的人际关系毁于一旦，而且很可能闹出不愉快的事。还比如，在不同的地域居住时间长了，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和做法。如广州人一年四季必须冲凉，而哈尔滨如果冬季冲凉，就会变成“冰雕”。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不再一一赘述。从以上就可以看出，进行文化交流，必须尊重别人的文化教养，包括学识、阅历、风俗、习惯等。否则，必然是相对无话，还谈什么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有的人不大注意上述情理，以为自己是“阳春白雪”，别人也一定是“阳春白雪”；或者自己是“下里巴人”，别人也一定是“下里巴人”。这种主观主义指导的交往活动，除了“谈不拢”、“合不来”还会有什么效果呢？当然，也可能“人以群分”、“阳春白雪”和“阳春白雪”交往，“下里巴人”只和“下里巴人”交往，即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那就圈子太小了，社会接触面太窄了，无法获取新的信息，和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广泛地开展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不合拍。因而，吸取宋儒兼容并包的智慧，尊重别人的文化教养，广泛地结交朋友，运用好当代大环境给人们提供的交通、电信等进行文化交流的优越条件，特别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搞好文化交往，为开展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多做贡献，把古代人向往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新的世纪里变成现实。

责任编辑 薛安泰